

專輯論文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 「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王豔

摘要

隨子女流動到城市、身體和心靈處於「雙重漂泊」的「老漂族」構成當今「老齡化中國」一幅具代表性的圖景。本研究基於對湖北省武漢市及鄂西某縣老人們的網絡民族誌調查，試圖探討移動社交媒體的使用為「老漂族」的社會交往實踐及社會關係再嵌入提供了怎樣新的可能性。研究發現，「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在流入地「落腳」、建立新的交往關係的入口，他們在網絡社區裡獲得「親如姐妹」的溫暖情誼。他們因流動而斷裂的舊的社會關係也通過微信的「攜帶」得到了持續的連接和維持，從而獲得一種「流動的地方感」。而在不得不頻繁移動、返鄉的生活中，他們可以通過微信對老家和流入地的不同空間之間的連接和切換，協調流動、暫居、安居不同狀態之間的張力。本研究在佔主導的「數字鴻溝」範式之外，呈現了通常被認為是政治經濟結構和互聯網使用中的邊緣群體—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如何運用中介化的新傳播科技能動地解決他們的社會交往困境。

關鍵詞：老年流動人口、微信、「可攜帶社群」、社會關係再嵌入

王豔，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講師。研究興趣：老年傳播、傳播社會學、城市傳播。電郵：yvonne_work@sina.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8年3月2日。論文接受日期：2018年10月24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Mobile Connecting and “Portable Community”: A Study on the Use of WeChat and the Social Re-Embedding of “the Old Drifters”

Yan WA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flowing of their children to the cities, “the old drifters,” whose body and mind are in double wandering, form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today’s “aging China”. This study, based on an online ethnography survey of the elderly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and a county in western Hubei, tries to explore what the new possibilities the mobile social media have supplied for the social interaction practices and the social re-embedding of the “the old drift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WeChat groups based on “square dance groups” provide the entrance for “the old drifters” to arrive in the cities and to establish new relationships. They gain the warmth of “sisterhood” in the online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WeChat groups. Besides, their past social relationships broken in their hometowns due to mobility also can be carried by WeChat, gaining a continuous connection and “a mobile sense of place”. They also use WeChat during returning to native lands to coordinate the tension among their different states of transfer, temporary residence and dwelling. Differing from the dominant “digital divide” paradigm, this study displays how the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who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 marginal group in 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 internet use, utilizes the mediation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cope with dilemmas and difficulties in social relations.

Yan WA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aging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urban communication.

Mobile Connecting and “Portable Community”

Keywords: the elderly mobile population, WeChat, “portable community”, social re-embedding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ang, Y. (2019). Mobile connecting and “portable community”: A study on the use of WeChat and the social re-embedding of “the old drifter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7, 87–133.

致謝

本研究受到香港中文大學「第十一屆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的支持，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媒體新聞傳播創新研究」（16JJD8600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作者衷心感謝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夏倩芳教授以及《傳播與社會學刊》諸位匿名評審、編輯對本文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研究背景與目的

新傳播技術和新媒介的普及、發達帶動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引人矚目的「流動轉向」(the mobility turn)，即打破過往將穩定和固著看做是社會常態和存在方式、不注重考察流動性(mobility)的靜態視角，從人、資本、技術、觀念、資訊、影像、交通工具、實物等現實的和潛在的移動來解釋社會生活如何被組織且被結構化(Cresswell, 2006)。近年來「新流動範式」(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Sheller & Urry, 2006)的興起又把關係取向的視角和方法論引入到流動研究中，使得傳播在「流動性社會」(social as mobility)的角色更加凸顯。

然而相比於「流動」在其他學科領域中的活躍程度，傳統的傳播研究中將傳播、媒體跟人和社會流動性連結在一起的分析不多，關於流動人群的研究亦偏向於對該人群的媒介使用特徵做一些靜態的描述，關注對象主要是流動兒童、流動勞工、城市白領新移民、跨國移民群體等，而對老年流動人口少有研究。

老年人通常被認為流動性較低的群體，然而在城市化、老齡化顯著加快的社會背景下，近年來中國一類日益龐大的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值得關注。與移民研究中的經典「推-拉」模型所認為的不同，這類老年人的流動並非來自經濟因素的推拉，而主要由於親情的牽引。受到傳統親情團圓觀念和家庭養老偏好的驅動，中國社會舉家遷徙的流動趨勢日益明顯，一些老人為了支持兒女事業、照料孫輩、實現家庭團聚，離開家鄉來到子女工作的陌生大城市，短期或長期居住，幫助他們照料家庭，這是當前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的主要動因。根據國家衛計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中國流動老人將近1,800萬，其中專門為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為與子女團聚或自行異地養老的比例為2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6）。

一般認為，流動人群來到遷入地後，舊的社會關係網突然斷裂，新的社會關係網尚待建立，是一個「雙重脫嵌」的過程，而流動老年人群由於身體和心理上的衰老，更加容易造成社會交往和心理上結構性的緊張。由於遠離「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又突然脫離「鄉里鄉親」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的熟人社會，他們不得不面臨著語言障礙、文化不適、生活習慣差異、缺乏歸屬感等困境，在晚年遭受身體和心靈雙重漂泊，大眾輿論及一些社會學研究冠之以「老漂族」，如何實現社會關係的再嵌入是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楊芳、張佩琪，2015；滿家輝，2014；劉亞娜，2016）。

這一群體及其境遇已經引起一些社會學、社會工作、老年學等研究領域學者們的關注，研究者們提出社會工作介入、調整公共政策、完善社區服務等幫助「老漂族」社會適應及融入的路徑（張紅濤、席娟，2016；楊芳、張佩琪，2015；劉亞娜，2016；劉慶，2012），然而由於學科視閥的局限，這些研究普遍忽視傳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

而在傳播研究領域，受到經典的「數字鴻溝」理論的影響，老年人群體通常被看做是採納和使用新媒介技術的「弱勢群體」。隨著網絡資費的降低和智能手機的普及，這一理論的現實基礎有所改變。老年人群近來已經成為中國社交媒體用戶數增長最快的群體，而微信是他們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2017；凱度調研，2016，2017）。微信不只是他們獲取醫療、健康、養生、生活等資訊的重要管道，也構成了他們表達自我、再社會化、溝通情感等的新的生活空間。

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歸屬感的建立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為流動人群社會關係網的重新連接、重新建構賦予了新的潛能。本文聚焦於中國城市流動老人「老漂族」與移動社交媒體微信之間的互動，考察他們如何在流動的生活中使用微信這一中介化傳播勾連網絡空間和現實空間，勾連家鄉和他鄉的社會關係網，從而維繫和拓展社會交往，尋求社會關係「再嵌入」。這裡的「再嵌入」（re-embedding）與「脫嵌」（dis-embedding）相對應，是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等（2004，2011）描述個體化社會中「個人與社會關係」變化的一對分析性及解釋性概念，本文用以考察「老漂族」在物理空間的流動之後，如何修復、重建原有關係網絡，如何嵌入到某種新的機制、制度、關係網絡的動態過程。

文獻綜述：流動研究與老年傳播

社會科學的「流動轉向」與「流動傳播」研究

資本、物體、人和資訊與日俱增的移動特性正在將一個「社會性的社會」(social as society) 建構成「流動性的社會」(social as mobility) (Urry, 2002a)。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2001) 在他形容的「網絡社會的崛起」中指出，網絡社會構成了新的社會時空，使得空間流動了起來，具有歷史根源、共同經驗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 正在轉化為通過流動而運作、具有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流動的空間」(space of flows)。「我們的社會是環繞著流動而建構起來的：資本流動、資訊流動、技術流動、組織性互動的流動、影像、聲音和象徵的流動。流動不僅是社會組織的一個要素而已：流動是支配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與象徵生活之過程的表現」(卡斯特，2001：505)。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 用「液態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來概括這種社會形態的變化，以區別昔日「沉重的」或「穩固的」現代性，在此時空關係發生了重大轉變，「變得是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動態的，而不再是預先註定的和靜態的」(鮑曼，2000：176)，隨之帶來資本與勞動的分離和人們從定居到遊牧的生活方式轉變。Urry (2003) 提出一個「全球流動體」(global fluids) 的本體概念——它是高度流動和黏滯的構成，其形狀是不均衡的、偶然的和不可預測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它為行動創造屬於它自己的語境。

這些論述構成和帶動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引人矚目的「流動轉向」(mobility turn)，「流動」遂成為許多學者描述、把握當代社會面貌、時代特徵的核心語彙和關鍵線索，以及解釋社會生活和空間再生產的重要視角，涵蓋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建築學、文化研究、科技研究、旅遊研究、交通研究、移民和邊境研究等學科領域，Urry (2002a, 2002b) 稱之為「流動的社會學」(the mobile sociology)。

人們如何在高速流動、「脫嵌」的現代性社會實現社會關係的「再嵌入」，亦即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所謂的「詩意地棲居」(Heidegger, 1971)，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命題。傳統的人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文地理學派認為這種歸屬和認同是內生的，來自於人固著於地而產生的個體經驗和主體性建構。人們通過對環境的體會及與空間的互動，經由情感的投注、意義的賦予轉換成記憶、懷念、想像等，將在地方的經驗納為個人經驗的一部分，將對地方的認同內化為自我認同，而移動所帶來的自由和動態則是扼殺這種歸屬的元兇（段義孚，1998；Relph, 1976; Seamon, 1980）。

以多琳·瑪西 (Doreen Massey) 為代表的結構主義派打破了這一對立關係，提出一種「進步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Massey, 1994)。所謂的「地方」不再取決於因空間上的靜止和固著而長期內化的歷史，而在於特殊人群在特定場所各種社會關係的建構，是在不斷與外界世界相聯系中持續性的外向性的生成。「每個『地方』都可以視作是社會關係、移動與傳播網絡交織而成的特殊的點……不能把地方看成是被邊界圍繞的區域，而是要將它們想像成社會關係和理解網絡中被關聯的時刻 (articulated moments)。這些關係、經驗和理解卻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一個比我們界定地方時更大的尺度上建構出來的……」(Massey, 1991, p. 28)。

上述看法促進了近年來「新流動範式」的興起，其關注點不再局限於地理空間的位移，而是著重從關係取向的視角和方法論，「去理解流動是怎樣被實踐和被體驗的，流動表徵和建構了怎樣的社會關係，流動如何體現和影響不同群體的身份和認同，流動的權力結構，流動過程中的權力博弈，如何通過空間和制度的設計與控制來治理流動等問題」(孫九霞等，2016：1802)。由是觀之，在移民研究中，流動人群、移民群體的認同、融入、社會整合問題也不應該被看做是一方被動適應另一方、一方同化吸納另一方的靜態結果，而是人們在流動的多重社會關係網絡之中能動地與「他者」的身份、經驗、情感、實踐持續不斷協商、操演的過程，這其中既包括尋求在流入地的關係建立和嵌入，也包括維繫與流出地的舊有聯繫和既有認同。「關係網絡」成為考察流動群體遷徙的基本分析單位 (Tilly, 1990)。

而傳播則是連接、編織這些社會關係網絡的中介，它中介了社會交往與日常生活，勾連起社會實踐場域中的行動主體及各種權力與關係。互聯網和新媒體更是讓這些互動和協商的進行不必面對面身體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場，使得「地方感」、歸屬感的建立能夠跨越時空界限。經由通信和傳播技術為中介，人們之間的聯繫和交往可以擺脫物理鄰近性的依賴，空間的邊界於是變得模糊起來，並且能夠互相滲透、交織、僭越，人們有可能時刻商議、切換不同空間裡的體驗和身份，從而打開了行動主體的能動性實踐空間。曼紐爾·卡斯特把這種具有樞紐、流通、轉換狀態的空間定義為「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指那些「通過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而所謂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指的是「空間把在同一時間裡並存的實踐聚攏起來」(卡斯特，2001：505)。實際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電視時代裡，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在考察人們在家裡收看電視行為時，就敏銳地發現，人們通過媒介螢幕，可以在「流動」於外在世界中獲得私藏於內的體驗，並提出「流動的藏私」這一概念(mobile privatization)(威廉士，1994)，但這一特點對於傳統媒體來說是少數例外。

而在如今，傳播科技的發展，尤其是移動傳播科技的興起和廣泛使用使得媒介的這一功能發揮地更加普遍，並發展出更豐富內涵，「移動」與「嵌入」、「流動」與「在場」的二元對立進一步被打破，一些被遮蔽的面向被討論出來。

Hiller與Franz(2004)研究紐芬蘭地區遷往加拿大其他的地區的移民群體在移民前、移民後、移民定居後通過互聯網與遷入地和遷出地進行的交流，發現互聯網的使用既可以幫他們整合進新的移民社群之中，也可以和過去的社群保持聯繫，維繫和重新發現他們和故鄉的聯繫，作為媒介的互聯網在創造新聯繫、維持舊聯繫和重建失去的聯繫這三方面均十分有效。黃厚銘與曹家榮(2015)在研究手機媒體的流動性時提出「雙面舞台」理論，認為手機「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讓人們得以隨時隨地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實在、「既隔離又連結」的行動空間，完成了雙面(或多面)舞台的展演，形成時而在場、時而連結、時而區隔、時而又涵括的含混人際關係樣態。潘忠黨與於紅梅(2015)借用文化人類學的概念提出，傳播媒介和資訊技術的發展生成了「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s)，有之間性、模糊性、開放性、非決定性和暫時性的特徵，並且具有在不同結構性狀態之間轉換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微用空間以脫離(be detached from)某種結構性的狀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態(角色、身份、活動等)，商議公與私、暫時與結構狀態等各種闕限轉換。這些實踐和與之關聯的體驗，具有非此非彼、模稜兩可、轉瞬即逝的特性，空間因此具有了一種創造、生成有別於日常生活的結構所規訓的秩序和內容的「潛能」(capacity)，存在於人們「行動的時刻和呈現的選擇」當中。移動傳播媒介的上述特徵為我們討論流動人群的社會關係再嵌入問題啟發了新的思考：人們否能夠通過對媒介的調用，有可能在其流動於外、不斷移動、遷徙的生活中建構起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社會關係雙重「嵌入」的交往實踐。

中國「老漂族」及相關研究

一般認為老年人群的流動程度比較低，因此中外學術界對老年流動人口的關注都遠遠低於對其他流動人群的關注。近些年隨著老齡化社會在全球普遍性的到來，逐漸有了更多的研究，議題主要關於老年人群流動、遷徙的動機、決策過程、行為特徵、遷自何方、遷往何處、對流出地及流入地的綜合效應等。國外學界主要通「推拉理論」(Lee, 1966)、「生命歷程理論」(Warnes, 1992)以及「地域認同」理論(Cuba & Hummon, 1993; Cutchin, 2001)等理論框架來解釋老年人流遷現象。綜合來看，這些研究認為，引致老年人遷移的動機有宜居環境、社會關係、養老服務和經濟因素等，主要受環境、照護、社區聯繫等影響(黃璜, 2013)，老年人的流動和遷徙主要基於獲得更優養老服務、提升生命健康水準等主動的理性選擇。

受到城鄉二元結構、東方式傳統親情、贍養觀念的影響，中國流遷老人的主要動因與西方國家顯著不同，他們主要為了與子女團聚、照顧第三代，流入到子女工作的城市，成為本文所說的「老漂」一族。「老漂族」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概念，而是一種形象化的比喻，指的是「人到老年以後，還要離開故土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那些老年人」(劉慶, 2012)。

這些老人的流動方向與中國人口流動、城市化進程方向大體一致，流入地主要是各種資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主要是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根據《新京報》一則公開報導，隨兒女遷居到北京的老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中，來自農村和中小城市的最多，依次佔36%和32%，然後是鄉鎮，佔18%，而來自大城市的老人最少，佔14% (陳璐、許驍，2017)。從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來看，隨子女流動到武漢的老人們大多是省內跨地區流動，以來自湖北省內的中小城市、縣城居多，其次是湖北省周邊省份湖南、河南、江西等地區。武漢高教資源豐富，大學生畢業後留下來工作、安家、定居，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往往也緊隨而來。

從階層背景來看，孟向京等(2004)的調查指出，北京流動老年人口以高學歷、非農業戶口老年人為主，具有夫婦雙方共同流動、其子女有著較強經濟實力、多為三代家庭等特徵，老人們退休前工作單位以黨政軍機關、科研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為主。在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中，隨子女流動到武漢的老人們本身經濟條件普遍較好，退休前大多工作在政府機關、國企、事業單位，有穩定的退休金收入。無需務農、打工，退休後時間空間，生活有保障，使得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對子女家庭和第三代的照顧之中。

儘管經濟上大體無虞，本該安享晚年的他們仍然承受著許多生活中不為人所道的無奈。根據《新京報》的報導，71.5%的老人感到「社交圈子小，會孤獨寂寞」，這是他們在異地生活遭遇的最大問題，其他問題還包括「醫保、社保問題」(61.6%)，「與子女生活習慣不同，易產生矛盾」(59.2%)，「來到陌生的城市，會無所適從」(56.9%)以及「子女條件有限，老人被動分居」(49.7%) (陳璐、許驍，2017)。

目前學界對於「老漂族」的關注主要存在於社會學、老年學研究領域，議題集中在「老漂族」的再社會化、社會融入、城市適應等問題及解決策略，提出的措施偏向「社會工作介入」、「社區治理」等方面。這些研究無差別地將他們看做是等待救助的被動的群體，忽視他們自身的能動性創造。他們如何在行動和與他人互動中應對這些交往困境、開展自己的生活，傳播、媒介無疑扮演著重要角色。

早期老年學研究認為伴隨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的衰老，老年人在社會角色、人際交往、認知行為等方面逐漸「與社會脫節」，趨向「退化」、「失智」、「失能」的狀態，與社會和個人隔絕來往，情緒低落，感到孤獨無依、生活無意義幾乎是老年人群及個體不可避免的境遇，此為老年學理論中著名的「脫離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 (Cumming & Henry, 1961)。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這一視角過度誇大了生理年齡造成的結果，而忽視了老年人的個體差異、主觀能動性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缺乏對老年人主體性和主動的創造性活動能力的關照，遭到了後來諸多學者的質疑和反思，研究者們據此展開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探索，提出：「活動」理論 (active theory)，認為老年人可以通過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增強生活滿意度和社會適應性 (Havighurst, 1961)；「連續性」理論 (continuity theory)，認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質與其業已形成的個性特點、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關 (Atchley, 1972, 1989)；「符號互動」理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認為老年人生活的環境、個體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影響著衰老過程，他們在所處社會環境中從與他人的社會交往和互動中所獲得的自我概念和認知影響著其生活滿意度 (Marshall, 1979)；「角色」理論 (role theory)，提出老年人如何適應過去的社會角色的退出、找到新的角色定位，順利完成角色轉換對於晚年生活品質很重要 (Blau, 1973; Sinnott, 1977)；「社會建構」理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ory)，認為老年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經歷和生命意義決定了他們的生活狀況 (Ruth & Kenyon, 1996)；「賦能理論」(empowerment theory) 則強調，社會工作的介入可以在身體、個人、家庭、群體、社區、政治等層面，協助老年群體減少無力感，提升社會交往與社會參與能力，建立更加積極的生活態度和自信，增加掌控所處環境並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增加面對衰老的心理調適 (Bland, 1996; Bounds & Hepburn, 1996; Kam, 1996)。

上述理論從各自的理論視角都肯定了老年人仍然保有「獲得」和「創造」的潛能，有學者據此提出「成功的老化」的概念 (successful aging) (Rowe & Kahn, 1987, 1997, 1998)，類似的說法還有「活躍的老化」(active aging) (Fernández Ballesteros, 200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具生產力的老化」(productive aging) (Caro, Bass & Chen, 1993)、「健康的老化」(healthy aging) (Khaw, 1997)、「強健的老化」(robust aging) (Garfein & Herzog, 1995) 以及「超越老化」(gerotranscendence) (Tornstam, 2005) 等理論及概念。正如人類學家景軍 (2017) 所指出的那樣，「老人不應該是被遠離的對象，或者是被由所謂『大愛』支持的對象。老人有自己的主體，社會也需要為老人創造能讓他們有主體性的生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然而在傳播學科裡，以老年人為主體研究對象的老年傳播研究起步比較晚，按照Angie Williams和Virpi Ylännne-Mcewen兩位學者(2000)的說法，國際傳播學界是在近60年裡開始對老人研究產生興趣。「老年人」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作為研究中的一個變項或分組出現，用以與其他分組進行對照，少有將「老年人」進行單獨研究，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老年傳播」。台灣政治大學的蔡琰和臧國仁兩位學者有感於家中老人的生命體驗以及中文傳播學界在老年傳播上的滯後，於2001年組織起「老人傳播研究群」，並於2012年出版《老人傳播理論、研究與教學實例》一書(蔡琰、臧國仁，2012)，是至今華語傳播學界在該領域最為全面的梳理。在中國大陸，儘管老年學研究在醫學、社會工作、心理學等領域已經有相當多的產出，老年傳播領域卻十分貧瘠，被稱為「被遺忘的角落」(吳歡，2013)，而探討老年人社交媒體使用的研究大多數還只是做一些簡單的靜態描述，理論化程度不高。

近年來，資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互聯網、新媒體研究如火如荼、層出不窮，而相較於對其他群體的研究，新聞傳播學科對於老年人與新媒介之間互動的關注仍然嚴重不足和滯後，有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研究的鴻溝」(Ihm & Hsieh, 2015)。亦有學者在SSCI等五個國際引文索引中，以「老年人」與「資訊技術/產品/服務/生活」、「數字技術/產品/服務/生活」、「新媒體/媒介」、「技術接受」、「數字鴻溝」為文題檢索關鍵字，截止2013年底，共梳理出相關文章65篇，研究內容集中在資訊技術的惠老發展規劃、資訊技術對老年生活的服務價值、影響老年人接受資訊技術的因素、老年人對資訊產品的使用特點、資訊產品的惠老設計五個方面(蓋龍濤、康智凱、黃子瑀，2017)。

對「數字鴻溝」的揭示是資訊技術、互聯網研究領域最富成果和影響的發現之一，該理論認為，相對於其他人群，老年人在互聯網的接入、心理、技能素養和使用上處於劣勢。目前關於老年人群的互聯網、新媒體研究大量圍繞的是對「數字鴻溝」的技術治理，包括：互聯網對於老人群體的作用和意義：提供健康資訊，提供社會支持和賦權，增加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增進社會交往、減少孤獨感，增加社會資本等(Barak, Boniel-Nissim, & Suler, 2008; Cotten, Anderson, & McCullough,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2013; Sum et al., 2008)；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行為和態度及其影響因素 (Kelley et al., 1999; Lam & Lee, 2006)；老年人無法以及不願近用互聯網、新媒體的障礙及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身體機能上的受限情況、缺乏技術幫助、無力支付技術設備費用等 (Blit-Cohen & Litwin, 2004; Marquié, Jourdan-Boddaer, & Huet, 2002)；縮小數字鴻溝，促進老年人互聯網採納的對策，如提供技術培訓，改進互聯網網站的設計，增加老年人專有網站，在老年人經常出現的公共空間增加電腦設備的投放，鼓勵家庭成員提供支持、增強代際之間的傳授等 (Gatto & Tak, 2008; Selwyn, 2004)。

上述研究具有強烈的功能主義範式預設，通常採用「採納與使用」、「創新與擴散」的理論模型來分析，其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阻礙老年人群互聯網使用的人口統計學因素和技術、社會原因，探尋促進互聯網向老年人擴散以及推進「智慧養老」的對策，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往往被當成既定、天然的「問題」。同時，對於互聯網使用這一充滿個性化、情境化的行為，這些研究忽視了老年人群體內部因心理、情感因素造成的具體實踐上的異質性，更缺乏對接入互聯網的這部分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如何運用新技術展開自己的生活、實現何等程度的社會交往和情感聯結之細緻考察。

學者邱林川 (2013) 在《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一書中打破「數字鴻溝」理論的絕對二分法，將具有「低流動性」的老年人歸類為「資訊中下階層」(information have-less)，介於「資訊擁有者」(haves) 和「資訊匱乏者」(have-nots) 之間的人群。他認為，由於醫療改革、獨生子女導致的家庭結構變遷、勞動者流動性大幅增加等因素，老年人利用資訊通信技術來獲取醫藥健康資訊和增加與遠距離家人的溝通交流的訴求十分強烈，而商品經濟化的電信市場和注重高精尖技術研發的政策導向使得具有節儉生活傳統或較低收入的老人難以成為電信設備生產商和資訊內容提供商的目標群體。因此，老年人被排除在「資訊富有者」的行列，轉而通過小靈通、預付卡等中低端資訊傳播技術來使得自身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滿足。老年人並非無知的、等待被教育的「資訊匱乏者」，而是積極利用資訊通信技術滿足自身需求的實踐者。然而，這些中低端設備功能簡單，一般只有基本的通信聯絡服務，無法充分提供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包括促進社會參與、擴展人際關係、資訊傳播與交流、促進尊重與賦權等在內的社會福利功能。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上述研究取向及發現的現實基礎有所變化，在一些國家，近年來老年人群接入和使用互聯網的比例大幅攀升，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在近5年來急速增長(Anderson & Perrin, 2017; Perrin, 2015)。而在中國，老年人正在成為社交媒體用戶增長的新動力。根據凱度調研發佈的《2017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截止2017年3月，50歲以上人群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為34.2%，60歲及以上人群使用比例為13.4%，相較於上一統計年度，用戶數增長百分比都超過了其他群體。兩組人群相加在社交媒體總用戶數中佔比達11.7%，較以往持續提高(凱度調研，2017)。由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聯合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共同發佈的《生活在此處——社交網絡與賦能研究報告》顯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中國老年人養老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老年人所使用的社交軟件當中，微信的比例是最高的(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2017)。除此之外，近年來「曬曬父母們的朋友圈」、「中老年表情包」、「老年人微信朋友圈為何鍾愛雞湯和謠言」等屢屢成為輿論熱點，表明老年人群對微信的主動使用已成為突出的傳播現象。

學者孫瑋(2015)將微信稱其為「中國人的在世存有」，認為微信除了功能性的使用，還提供了一種其他媒介無法提供的深切體驗：存在於眾人中、存在於世間的存有感。由此出發，本研究意在以「老漂族」的微信使用為切入點，考察和探尋他們如何在日常交往實踐中使用這種中介化的新媒介技術和傳播，創造性地勾連和改造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絡，新媒介技術又是如何介入、生產、重構他們的流動空間。在這裡，本文採納空間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列斐伏爾的觀點，將「空間」視為不僅僅只是社會關係和社會過程運行的既定容器，而是「被列為生產力與生產資料、列為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特別是其再生產的一部分」(列斐伏爾，2003：51)。

有研究者將移民群體在互聯網上的聯繫分為三種：新的聯繫(new ties)、舊的聯繫(old ties)和失去的聯繫(lost ties)，發現互聯網的使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用既可以幫他們整合進新的移民社群之中，也可以和過去的社群保持聯繫，維繫和重新發現他們和故鄉的聯繫 (Hiller & Franz, 2004)。與西方社會的移民不同，由於中國屬地化管理、戶籍制度的約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強大聚合力，「老漂族」們的「根」仍然在老家，各種社會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們在流入城市後仍然需要具身性地往返於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間。同時，有別於普遍嚮往城市生活、通常為「候鳥式返鄉」的農民工群體，因「照顧子女生活」而來的「老漂族」們對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鄉有著更深的眷戀，由於不參與流入地的經濟活動，他們在流動時間的掌握上相對更加自由，返鄉頻率更高。對中國「老漂族」微信使用的考察，除了考察他們與流出地、與流入地的聯繫之外，不可不將他們返鄉過程中的使用情況納入進來，特別是身體移動和移動社交媒體如何相互配合。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具體的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在流入地結交新的朋友，這對他們新的社會關係的創造和擴展有何作用？

研究問題二：「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與老家的親友聯繫，這對他們舊關係的找回和維護有何作用？

研究問題三：「老漂族」們在返鄉過程中如何使用微信，這對他們在不同空間之間的連接與切換有何作用？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由於本研究探尋的是老年人的微信使用，因此主要採取網絡民族誌 (internet ethnography) 的研究方法 (又可稱為「虛擬民族誌」(virtual ethnography)、「賽博民族誌」(cyber ethnography)、「線上民族誌」(online ethnography)、「數字民族誌」(digital ethnography)。網絡民族誌是隨著互聯網發展起來的一種民族誌方法，以方便對互聯網及相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探究和闡釋。按照Hine (2000)的界定，它是在虛擬環境中進行的、針對網絡及利用網絡開展的民族誌研究(ethnography in, of and through the virtual)。根據羅伯特·V·庫茲奈特(Robert Kuznets) (2016)的定義，網絡民族誌是應用於當前以電腦為中介(computer-mediated)的社會世界中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基於線上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可以看出，與實地民族誌相區別，網絡民族誌是以網絡上的個人及社群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在網絡上進行觀察和資料收集。

近年來，微信日益構成人們新的生活和交往空間，特別是借助朋友圈、微信群裡的「書寫」，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方便地記錄、表達、展示自我。由此，網絡民族誌又誕生了微信民族誌這一類別，即「基於移動互聯網的網絡現實空間或微信社群的田野工作的文本及參與觀察記錄」(唐魁玉、邵力，2017)。不少社會學者、民族研究學者都呼籲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將田野擴展到微信裡的「微生活」空間：「世界文化在發生著一種方向性的轉型。對中國而言，由微信群所帶動的生活方式的變革，必將是一個借助微信書寫的新途徑而構成大眾表達的微信民族誌時代的來臨」(趙旭東，2017)。近兩三年國內已有學者開展了為數不多的採用微信民族誌的研究，例如孫信茹(2016)對普米族年輕人使用微信參與文化實踐的考察。

由於網絡的虛擬性和身份隱匿性，研究對象的線上自我與線下自我時常有不一致、割裂的情況存在，研究者在網絡環境中所觀察到的可能只是「一個片面的、有限的畫面」(卜玉梅，2012)。同時，線上空間和現實世界也是相互嵌入，互為建構的。因此一些學者主張除了在網絡虛擬田野中進行參與觀察和利用網絡媒介進行訪談之外，理論上還應開展網下的觀察和訪談(Sade-Beck, 2004)。因此，本研究在執行中將線上觀察和線下的半結構訪談相結合，兩方面的內容注意相互驗證和校正，將他們線上的發帖、交流行為放置在其生命經驗和生活脈絡之中進行理解和闡釋。

具體來說，首先是通過一位熟識的阿姨1號受訪者的拉入，筆者加入了以「老漂族」人員為主的A社區和B社區兩個廣場舞微信群(以下簡稱A群和B群)，兩個群的成員都是通過線下的廣場舞團體組織、聚集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到群裡來的。兩個群的成員有部分重複，除了筆者，總共有75位成員，他們目前都在武漢光谷地區隨子女生活。武漢是中國大陸高教資源十分集中的城市，也是中部地區的特大中心城市，每年都有大量的「老漂」人群隨著他們畢業留漢工作的子女流動而來，選擇這樣的研究對象對於本研究主題具有代表性。

自2017年9月筆者展開了半年多的線上觀察，隨時隨地觀察他們在互聯網空間裡的交往情況，收集整理兩個微信群的聊天記錄和部分成員在微信朋友圈的書寫內容，獲得了豐富的文本資料。為儘量保證所獲取資料的自然狀態，在平時的線上觀察中，絕大部分時間裡筆者在群組裡都保持「暗中觀察」的「潛水」狀態，對成員們之間的討論不介入，遇到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發言時，筆者一般會發起一對一私聊以便進一步確證、了解情況，或者約定進行線下的面訪。最後對五位成員進行了線上的單獨深入訪談，對其中三位成員還進行了多次的線下面訪，每次訪談時間在半小時到1小時30分鐘之間（訪談提綱見附錄一，訪談對象基本情況見附錄二）。

上述觀察、訪談對象裡面，在微信群裡發言的成員一般都是願意與陌生人交往、對流入地適應較好的老人，為了擴大研究對象流動地域和人格特質的多樣性，筆者還在同期觀察的家鄉湖北省西部H縣一個以本地老年人為主的微信群裡，對六位曾有過異地流動經歷的成員就本研究主題進行了面訪，每次訪談時間在半小時到1小時20分鐘之間，他們分別在武漢、深圳、青島、上海等地有過短期或長期隨子女居住的經歷，其中五位訪談對象未參加過流入地任何的線上、線下的社會群體（訪談提綱見附錄一，訪談對象基本情況見附錄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同步助手」軟件導出、保存和管理微信群聊天記錄和微信訪談記錄，該軟件能自動將微信移動客戶端上的所有聊天記錄導出為方便進一步歸納、搜索的Excel文檔格式，此外本研究還將線下半結構訪談錄音全部轉成了文字稿。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具體研究問題，筆者首先將上述資料編碼為以下三個主題類別：與流出地的聯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繫(舊關係的維護)，與流入地的聯繫(新關係的建立)，返鄉流動中的聯繫。

然後，通過與上述主題類別有關的關鍵字、語句、片段的搜索和整理，研究進一步篩選、提煉出下面幾個子分類，其中「與流出地的聯繫」主題包括：「流動到異地的感受」、「在流入地新加微信聯繫人的情境」、「在流入地使用微信的感受」；「與流入地的聯繫」主題包括：「微信上與老家人聯繫的關係人構成」、「微信上與老家人聯繫的內容訴求」；「返鄉流動中的聯繫」主題包括：「返鄉流動的原因」、「返鄉前對微信的使用」、「返鄉過程中對微信的使用」、「返鄉後對微信的使用」。研究對上述質性材料及典型個例的具體分析和闡釋見接下來三個部分的內容。

編織與勾連：

微信與「老漂族」流入地社會關係的「嵌入」

追隨子女而來的「老漂族」大部分來自於小城市、縣城、鄉鎮這樣的「熟人社會」，流動到城市以後，儘管能與家人團圓，社會交往的突然被迫切斷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區鄰里關係的缺失都讓他們普遍更容易感到內心孤獨：「出去誰也不認識，只能成天關在家裡，有時簡直像坐牢一樣」、「待著這裡太憋屈了」、「也沒個聊聊天的朋友，連對門對戶都不認識」等等是筆者在調研中聽到的他們剛來城市最大的「不習慣」(7號受訪者、10號受訪者、11號受訪者)。因此在照料家庭事務之外，他們有著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的迫切需要。本部分旨在考察第一個研究問題，「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在流入地結交新的朋友，這對他們新的社會關係的創造和擴展有何作用？

傳播研究領域目前關於中國老年人社會交往的研究大量是對廣場舞的觀察，這些研究表明，跳廣場舞是當代中國老年人排解孤獨、尋求認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徑。微信興起並在中老人群流行開來以後，現實空間裡已有的廣場舞社群走向網絡化，通過微信群迅速在網絡空間裡得到移植、維護、深化和延伸，形成他們在流入地與人互動交流的重要的交往空間。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落腳「廣場舞群」：「老漂族」的社會關係接入

過往的研究表明，「老漂族」在流入地的社會關係呈現內卷化、不穩定、淺層次的特徵，交往範圍小，以家庭關係和同鄉關係為主（李靜雅，2014；楊芳、張佩琪，2015；劉亞娜，2016）。「老漂族」們普遍對老家「走兩步就能見到熟人」的氛圍甚為懷念，然而由於對交通不熟悉，他們來到城市後，身體活動範圍多數局限在社區周圍，如何重建親近的鄰里關係、朋友關係，重新找到傳統社區裡的人情味，對於他們適應和逐漸融入新的生活環境以至形成歸屬感尤為重要。在中國城市社區，由於社區橫向組織發育不良，「老漂族」們往往缺少參加社區活動、結識鄰居的管道，而微信群正成為他們新興的交往空間，尤其是建立在現實廣場舞團體之上的廣場舞微信群成了他們在城市重要的落腳點。

「剛來這裡時我不太習慣，沒有認識的人嘛，我就去社區裡面和附近跳廣場舞的地方問領舞的人能不能參加跳舞，他們很歡迎我，就互相加了微信，然後就把我拉到了微信群裡，說這樣以後有什麼通知方便一些，後來跟群裡幾個跳舞跳的好的、聊得到一塊的人又建了一個小群。」6號受訪者坦言她來到深圳最先認識的朋友就是社區廣場舞隊的「姐妹們」。

1號受訪者隨女兒來武漢定居四年多，在武漢一共加入了三個微信群，都和廣場舞有關，除了參加自己社區的廣場舞團體然後被拉入到微信群裡，因為常常去隔壁另外一個社區練舞，還被拉入到隔壁社區的廣場舞微信群裡，由於空間位置接近，這兩個微信群的人員重合率相當高。此外，她還和兩個群裡面其中六個「興趣愛好相同、脾氣性格較合、比較投緣」的舞友建了一個名為「姐妹情」的小群，「在這個群裡，大家聊天可以放得更開些」。

2號受訪者來武漢五年多，每天早上給全家人做完早餐後的9點到10點半和每天晚上洗完碗後7點到9點是她固定的鍛煉時間，她目前在自已社區參加了太極拳隊、扇子舞隊、毬子舞隊、佳木斯健身舞隊，合唱隊等，每支隊伍每個舞種都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你哪天不想去的話，他們還會輪番在微信裡喊你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這些廣場舞微信群的群主通常也是實體舞蹈隊的組織者，建群的初衷一般是便於舞蹈隊的組織管理，包括向成員發送通知，比如跳舞的時間、地點、著裝要求、臨時變動，以及成員有事向組織者請假等等。每天早到跳舞現場的成員就會在群裡發出號召，「姐妹們出來舞舞啊」，「今天我們學新舞，希望大家把家裡事安排好，早上出來學習學習」。有些群主十分善於運用微信鼓勵大家堅持跳舞，有一天早上天氣冷，去跳舞的人比較少，A群群主3號受訪者就把現場數人不畏嚴寒、專心致志跳舞的狀態拍成視頻上傳到群裡，馬上引來了其他成員們在群裡表達出讚揚和嚮往之情。這些信息不僅發揮著傳遞性功能，還推動、維繫了「老漂族」們在現實空間裡的交往，使之更有常規性、穩定性。

雖然多是以「XX社區舞蹈隊」命名，這些微信群卻有著很大的開放性，和現實實體裡的成員並不完全一致。A群群主3號受訪者就告訴筆者，「只要想進群的，都可以進來」，B群的成員們則多次表示，「進了一個群都是姐妹」。群裡除了廣場舞隊的成員，也有一些成員們在練舞、交流、演出等場合認識的社區外面的人，他們有的只是在現實空間中萍水相逢，今後也很少有機會再重逢，卻可以通過微信延續、深化著交往。

微信作為移動社交媒體，不僅是資訊傳遞的管道，也是具有「雙重勾連」作用的意義媒介，勾連著人們不同時間、空間、向度上的自我存在和社會關係(孫信茹，2016)。「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落腳城市的重要入口，一方面，微信通過現實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雙重勾連、網絡節點之間的相互連接，維繫、擴大著「老漂族」的交往範圍。另一方面，通過大群套小群、不同群之間交織互聯的這種層級化、圈子化的多圈層式的交往和互動，微信在短時間裡編織起他們在流入地的社會關係網，並使之更趨穩定和緊密。

「進了一個群就是姐妹」：「老漂族」微信群的共同體塑造

被1號受訪者拉入群後，筆者發現在群裡成員們言必稱彼此為「姐妹」，這讓筆者頗為好奇，初衷用於通知的廣場舞微信群如何成為對於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老漂族」們「親如姐妹」、有歸屬感的共同體？在觀察和訪談中，筆者發現「老漂族」微信群有其特別的「姐妹」情誼塑造機制。

在傳統熟人社會中，儀式是維繫共同關係、人與人互動、形成鞏固村落共同體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機制，發揮著凝聚社會、融和情感、傳承文化、確認秩序等重要功能。所謂「儀式」即是一種「組織化的象徵活動與典禮活動，用以界定和表現特殊的時刻、事件或變化所包含的社會與文化意味」（費斯克等，2004：243），包括禮節、典禮、巫術、禮拜、慶祝、日常儀式化行為等類型（王霄冰，2008：15），具有重複性、程式化、象徵性等特徵。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2009）發展出互動儀式理論框架，認為其構成要素有四：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身體共同在場、對局外人設定了界限、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活動或對象上、人們分享共同的情緒和情感體驗。

大眾傳播的發展和普及使得儀式的形成和傳播能夠跨越空間的阻隔，而在以社交媒介為中介的網絡交往中，儀式被完全符號化了，通過圖像符號、文字符號來構成。同時與傳統媒體提供的「媒介儀式」相比，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還能進行即時的互動和參與，形成共同的「虛擬在場」和新的情感聯結形式，也促進了新的儀式、符號和意義的產生。在「老漂族」微信群裡，「歡迎」儀式和「早安」儀式成為「姐妹情誼」塑造的兩大重要儀式。

相較於於筆者同步觀察的以本地人為主的老年人微信群，「老漂族」微信群的進群方式更有儀式感也更加隆重。例如，筆者由1號受訪者拉入群裡時，先是1號受訪者在群裡向大家說明，「姐妹們，這是我的朋友喲」，「謝謝姐妹們歡迎我的朋友」，然後是筆者做自我介紹，接著很快筆者收到了群裡成員們潮水般的各種各樣的歡迎形式，有「禮炮齊鳴」的動態圖片，有絢爛的動畫煙花，有熱情洋溢的歡迎辭——「熱烈歡迎新朋友」、「進了一個群就是姐妹」，令筆者頗有受寵若驚之感。據筆者觀察，其他新成員進群時，上述儀式和步驟幾乎會重複發生。由於在異鄉缺少朋友，「老漂族」格外注重進群的儀式，這種儀式感的營造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交往的迫切渴望，同時也具有了一種生產性意義，那就是通過快速賦予新進成員集體身份，鞏固和維護「我群」的存在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早安」問候和節假日問候是老漂族「微信群」裡另一項重要儀式，受訪者中很多人表示一早起來睜開眼第一件事就是向群裡問「早安」，這已經成為他們每天的習慣，或是一張簡單的圖片，或是一句簡短的文字，或是精心撰寫的一段話：「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就是與你說早安。言不在多，一句早安溫暖你的心，一句早安讓一整天的你充滿陽光，微笑，正能量。用一句溫暖的早安開始新的一天吧，早上好！」。為了保證每天不重複以及有新意，他們通常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各種渠道搜羅上述資訊，但依然樂此不疲。除了每天日常的問候，老人們也會配合節慶、時令、特定情境、場景對問候語句進行相應創作，例如夏天天熱時會加上「照顧好自己，相處是緣，問候是情，願我的問候能給你帶來絲絲涼爽」，重陽節時的問候則會增添登高望遠、賞菊等節慶意向。

問安、問好是中國傳統人情社會裡的重要禮節，受到現代性衝擊而在現實交往中被淡化、消解，老年群體借助社交媒體使之在微信社區裡得以「復興」且更加靈活、持續而日常化。這種無需回復的簡短資訊，對於資訊的發送者，一方面可以向其他成員傳達出「我很關心你、在意你」的情感，從而獲得社交滿足感，另一方面他們在每天打卡般的問候中日積月累形成了網絡空間裡的實踐慣習，培養起對社群的歸屬感來。同時對於群裡的成員們來說，彼此的「早上好」問候也營造起群裡熱鬧的氛圍，使得他們每天一早就感受到被關心被關注，得以維持最低限度的往來，這對於那些群裡不愛發言的成員也有意義。

「我在群裡不太愛發早安啊節日好啊什麼的，我覺得那樣比較刻意。但每天早上一睜眼會習慣性地刷群，看到他們發早安，心裡還是挺溫暖的，哪天群裡沒人發，還會感到少了什麼。」(5號受訪者)

儀式性的交往雖然頻度很高，一般停留在禮貌上的、象徵性的互動，成員們之間難以進行情感上的深層交流和溝通。筆者觀察到，「老漂族」們在微信群裡借由對共同話題的分享、討論所進行的意義生產和共享在「姐妹情誼」的塑造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這些分享和討論大多是借助轉帖來實現的。微信不僅是社交媒介，也是重要的資訊傳播媒介。根據艾媒諮詢發佈的《2016年App與微信公眾號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微信公眾號數量超過1200萬個(艾媒諮詢，2016)，這成了成員們之間信息流動的主要來源，也就是「轉帖」現象。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除了日常事務的通知、廣場舞的學習交流之外，「老漂族」們之間的轉帖分享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資訊和話題，形式包括文章、視頻、圖片、段子、順口溜等：

健康養生類資訊，例如〈抗癌防癌蔬菜排行〉（A群2017年10月12日聊天記錄）、〈拍打一個地方，能排掉100多種疾病〉（B群2017年10月16日聊天記錄）、〈癌症起因已找到，太可怕了，再忙也要看看！〉（B群2017年10月17日聊天記錄）；

勵志類文章、心靈雞湯，例如〈91歲老太太，身型似18，一出場驚豔全場〉（A群2017年10月22日聊天記錄）、〈人生，要有陽光般的心態〉（A群2017年10月17日聊天記錄）、〈人活著，誰都不用瞧不起誰。三年河東，三年河西！〉（B群2017年10月21日聊天記錄）；

傳遞愛國情感的文章，例如〈中國量子衛星了不起！厲害了我的祖國！〉（B群2017年10月21日聊天記錄）、〈昨天毛澤東女兒公開露面，太漂亮了，習總親自接見〉（B群2017年10月23日聊天記錄）、〈總書記說：「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裡，碗裡面主要要裝中國的糧食」〉（A群2017年10月18日聊天記錄）；

生活資訊，主要是關於停水停電、美食烹飪、服飾美容等的生活資訊、小竅門等，例如〈農村婆婆教我這樣醃黃瓜，給肉都不換〉（A群2017年10月21日聊天記錄）、〈一根筷子竟然也能編出好看的髮型〉（A群2017年10月16日聊天記錄）。

前三類資訊被他們稱為「正能量」資訊，指的是那些對人生有幫助，給人以正面情緒和向上力量的資訊，後一類資訊的分享主要是利他性的動機，指那些「別人不知道的、新奇的」資訊，分享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這些資訊切合了老年人群體的心理需求，因此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興趣和共鳴，發送者從中收穫了自我價值感和滿足感，而其他人則通過對這些資訊的支持、評論、轉發，完成了意義共享和情感認同的過程。

除此之外，相較於以本地老人為主的微信群，老漂族們更加熱衷分享「親情」、「養老」之間的話題，也往往最能引起成員們熱烈的討論，他們善於挪用媒體的報導，對這類話題進行共同解讀、闡釋和延伸。例如一次1號受訪者在「姐妹情」微信群裡分享了一篇名為〈兒子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媽去養老院，看哭了！我連看了三遍》的文章，大家迅速展開了如下討論：

「秀」：你在哪找視頻，把我看哭了是小事，關鍵把小孫爺也跟著哭了連聲喊媽媽，傷心的不得了。

5號受訪者：這視頻看後，心酸，淚水都流出來了。兒子左右為難。

1號受訪者：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也要面臨養老的問題，誰也不知道未來的路怎麼走，趁我們現在還能跳，還能跑，開開心的過，車到山前必有路，姐妹們不必傷心，快快樂樂過好每一天。

5號受訪者：是的妹。是你說的，趁我麼現在還能跳，能跑，開心快樂過好每一天吧。

「王敏」：姐妹們說得對，一起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

5號受訪者：妹妹們：我們開心快樂舞一天，過好每天的生活：注意保重身體，健康的活著

「秋韻」：這個是我們都將面臨著的問題。等我們老了那一天孩子們沒多少精力來照顧我們。像我們的條件也請不起保姆，養老院是我們的歸屬。

「秋韻」：所以我們群裡姐妹們有緣走到一起，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等我們老了跳不動了就一起散步聊天，抱團養老！

4號受訪者：就是呀，等我們都老了就到一個養老院，我們姐妹還在一起。

「王敏」：嗯

「王敏」：我看完了，估計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命運

關於如何養老、在哪裡養老的問題，老漂族們比在本地的老人有更深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在現實中難以向子女和旁人表達，微信群裡的分享和表達則提供了他們體面地釋放情緒的管道，這樣的話語互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動促進了「闡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 (Hyme, 1980) 的形成，他們從建構共識和情感慰藉中加深了彼此的關聯和歸屬。

除了虛擬世界的互動之外，微信群還勾連起他們線下的結伴活動，豐富、擴展、鞏固了他們之間的交往關係：

一方面微信群使得「老漂族」線下活動更有組織性。除了平時每天的練舞之外，微信群組織的其他線下社會性活動還包括互助性活動，例如紅白喜事、生病探望等，以及娛樂性活動，例如外出演出、聚餐、結伴出遊等。活動一般在微信群裡發佈、報名和集合，相比以前的短信、電話通知，免去了一對一逐個通知的麻煩，使得活動開展地更有組織性，在一定程度上補償、替代了橫向社區組織功能上的不足：

群裡有姐妹家裡有喜事，或者誰生病了，我們都湊一點份子去，關係都較好，有時我們AA制聚餐，有時我們結伴週六週天在周邊遊，有時我們結伴逛街購物，最近我們有個計畫，與深圳廣場舞一個隊聯繫，兩隊互動準備到深圳、香港遊，她們也來武漢遊。
(1號受訪者)

另一方面，在組織線下活動時，微信群還通過保存和塑造集體記憶的方式促進著「老漂族」的集體團結。所謂集體記憶「並非其成員個體回憶之總和，而是社群成員的共享記憶。就此而言，它意味著所有成員都能夠回憶起來的一種共同的過去」(Zerubavel, 2003, p. 4)，是共同體建構的重要中介。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是最重要的集體記憶機構，而新型移動社交媒介微信以其集合多種媒體表達形式，為老人們開展自主性的交往活動提供了一種操作方便的集體記憶數字載體。

進行線下的結伴活動時，成員們會隨時隨地通過微信群與沒有來參加的成員們進行互動，分享途中所拍的精彩照片、視頻、見聞和感想，後者往往會送上稱讚之情，表達出身臨其境的感受：「姐妹們玩得好開心呀」，「大家今天都好漂亮，個個都是美女」……這種遠程的交流在成員們之間形成共同的關注，在場的成員在身體的流動中獲得一種認同感，其他成員也間接參與了集體活動，獲得「虛擬在場」的參與感，微信群裡熱鬧的討論和現實空間裡熱火朝天的活動通過傳播達成了連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此外，活動結束後通常還會有人把這些照片、視頻精心製作成文字優美、配樂精美的相冊、視頻影集進行二次傳播，這主要得益於視頻製作工具如美圖秀秀、美篇、彩視等軟件在老人群體之間的普及和流行，面向老年人群體的微信公眾號例如「新老人」等也提供相關服務，操作簡單易學。老人們在這些平台上可以方便地對照片進行文字添加、配圖、配音樂，然後保存在個人帳戶裡面，也可以直接分享到微信群聊，私聊和朋友圈。在上述過程中，微信平台成為了老人們集體記憶書寫、分享和存儲的空間。電子相冊裡充滿感激和懷念的文字、悠美的音樂和大家歡快的笑容、熱鬧的場景，為這些集體活動打上一層玫瑰色的濾鏡，將其美好鮮活地展現在人們眼前，創造出彼此之間情感的聯結和共賞的空間，進一步增進了集體團結。

「可攜帶社群」： 微信與「老漂族」流出地社會關係的「再嵌入」

跨地域流動是一個「脫域」和「脫嵌」的過程，既意味著對原有地理邊界的穿越，也意味著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脫離出來（吉登斯，2011）。「老漂族」們在流動之前的生活和社會關係是長時間、高度地域化的，數十年來根植於家鄉的人情關係網和習得的規範性知識，是他們實踐意識、自我認同、歸屬感、本體安全感的重要來源。而「流動」的生活硬生生地切斷了他們過去的一整套社會性關聯甚至連根拔起，因為空間的阻隔而使得生活情境被割裂，原有的社會人際關係被分散，親戚之間變得疏遠，鄰里關係、朋友關係網絡、相處融洽的小群體等都被拆散。由此，本部分旨在考察第二個研究問題，「老漂族」們如何使用微信與老家的親友聯繫，這對他們舊關係的找回和維護有何作用？

Licoppe (2003) 在考察移動電話與社群關係時認為，不停地打電話可以讓人們覺得並確保與他人的聯繫永久存在。然而這一點對老年人群體並不適用，在微信興起之前，儘管可以通過座機電話、手機通話與老家的親人朋友們聯繫，但普遍有勤儉節約傳統的老年人們往往並不捨得用來進行長時間的情感交流，一般只作為「報平安」、「說急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事」、「節假日問候」等簡短溝通之用。而使用移動社交媒體微信則完全無需經濟方面的顧慮，當被問及微信有哪些好處時，老人們異口同聲說到的最多的答案就是「打電話不用錢」。由於無線局域網(WiFi)在家庭中的普及，通過微信，「老漂族」們便能隨時隨地以較低的費用來與遠方的親朋好友取得和保持聯繫，同時比起電話聯繫，微信生產的這種「共在」空間又是更具有實在性的，通過視頻通話功能，他們不僅能即時通話，還能看見對方的形象、一舉一動和周遭環境。

Chayko (2008) 提出「可攜帶社群」(portable communities) 的概念，認為通過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的中介化，無論是與社群經常見面、偶爾見面或是從不見面，人們在流動的過程中都能隨時隨地維持、建立和獲得社會交往以及情感上的聯結 (connectedness)，社群因此從物理空間的束縛解放出來，從而變得具有「可攜帶性」(portable) 和「可移植性」(portability)。微信勾連起流出地和流入地不同的時空，使得「老漂族」們在家鄉的社會關係網絡變得「可攜帶」，他們因流動而斷裂的社會關係通過微信的「攜帶」得到了持續的連接。

用76歲的9號受訪者的話來說，「微信在哪裡，人就在那裡，朋友就在哪裡」。因為小兒子自大學畢業後在武漢工作、定居，而大兒子仍在家鄉，她頻頻來往於家鄉與武漢之間。為了方便與兩地的親朋好友聯繫，在晚輩的指導下，她今年開始學用微信，一用上就一發不可收拾。由於年輕時沒有受過識字教育，她不會打字，只會發語音、圖片和表情，但這並不妨礙她對微信的沉迷，家鄉的朋友們經常深夜收到她突如其來的一聲「問候」，大家因此送了她一個外號叫「老頑童」。

《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導也描述了類似的一幅景象(張豔如，2017)：

半夜醒來，59歲的李小平聽到微信的消息提示音緊湊地響著，忍不住摸過放在床邊的手機，解鎖，點開微信，一氣呵成。

她的山西老鄉群裡，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著爆款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李小平插了句：「怎麼半夜了還不睡」，隨後，也忍不住加入了這個平均年齡60歲左右的聊天隊伍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感覺現在沒了微信，人就很不閉塞，就好像睜著眼看不見世界的感覺。」李小平晃晃那部兒子給買的玫瑰金智能手機。

作為中國各人群目前最普遍使用的社交聯繫軟件，微信「攜帶」的社群幾乎可以移植過來「老漂族」們在家鄉積累的整套的社會關係網，這些關係以親緣、地緣、業緣、學緣為主，包括他們的家人親戚、各求學階段的同學、各工作階段的同事、鄰居、老街坊、以及在各種場合認識的朋友等等。老人們和他們之間既可以進行一對一、點對點的個人之間的私密性的即時聊天，也可以在朋友圈、微信群裡進行一對多的隨時隨地的交流互動。他們的肉身雖然不在當地，卻可以通過微信連接起來的網絡社群實現對家鄉社會關係網的再嵌入。

2號受訪者向筆者展示了手機裡保存的和老家人有關的微信群，包括各種親戚群，小學到中專的同學群，工作單位群，在老家參加的廣場舞群，知青群、好友群，等等，不下二十個，有的是在老家時就已經加入了的，有的是流動到武漢以後才加入的，比如去年一次返鄉聚會上，當年一起參軍的戰友們聊起如今很多人也在武漢，大家就一起建了一個「武漢戰友群」，她也被拉了進去。對於性格偏內向的她來說，很多時候即使只是圍觀這些家鄉人發在群裡的各種資訊和他們之間的互動，也有著重要意義：

雖然現在到武漢以後，很少在以前老家的同學朋友的微信群裡發言了，但每天刷一刷這些群，看一看他們的朋友圈，哪家發生什麼大事小事，大家最近在幹什麼，我都知道。(2號受訪者)

這種「我都知道」建構出來的遠方的「在場感」和「共在感」，生成「流動的屬真性」，建構出人際關係上的親切體驗和心理滿足，很好地緩解了他們在異鄉的思鄉之情。另一方面，對於他們在老家傳統熟人社會裡維護面子和人情有著重要意義的「趕情答禮」，如今也不再有了距離上的阻隔，而是通過微信紅包、轉賬得到了維繫，「從群裡知道了哪家有了紅白喜事，雖然我人沒回，但錢一定要送到。現在微信很方便，再不用麻煩老家的人轉交了。」(8號受訪者)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熟悉的人際關係也給了他們情感傾訴的安全感，和老家親朋好友通過微信的私聊構成了他們表達真實自我和真實情緒的後台。黃厚銘、曹家榮（2015）在研究手機的流動性時指出，手機創造出使用者「雙面（多面）舞台」的展演空間，由於手機「即刻連結」的技術特性，讓人們得以隨時隨地架接起一個混雜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實在的行動空間。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也借用戈夫曼的戲劇理論，指出人們在微信等社交媒體的交往場景中劃分出前台和後台，在個人資訊界面、聊天界面和微信朋友圈進行著不同開放程度的自我呈現（孫璋，2015；劉硯議，2015）。

雖然跟這裡廣場舞的姐妹們也比較熟了，玩得比較開心，但是真正知心的朋友還是不多，接觸的時間不長，每個人的性格摸不透，所以不能深交，再者人員的流動性大。在老家認識的朋友幾十年了，每個人的性格相互了解，知根知底，大家相處可以揚長避短。（1號受訪者）

孤寂、壓抑是「老漂族」們流動到陌生城市的常有心理困擾，此外，由於中國城市房價高企，「老漂族」的子女又尚處在家庭和事業的起步期，一般無力購置第二套房，「老漂族」流動到城市後通常都是和子女們同住，兩代人長期擠在一起，難免會有生活方式、教育觀念、婆媳關係、翁婿關係等方面的摩擦和矛盾，老人也容易產生「不是自己家」的不自在感，加劇心理不適，因此來自社會關係網提供的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對於他們情緒上的紓解十分重要。在微信興起以前，由於子女們忙於工作、早出晚歸以及和老家人缺少方便、經濟成本低的交流管道，他們所能獲得的心理慰藉比較有限，「自己消化消化也就過去了」。而通過微信和老家親朋好友交流、傾述，不僅及時紓解了他們在異鄉的焦慮與壓力，還使得他們暫時脫離了流動的結構性身份，於「當下」同子女共住的生活空間和情境中劃分、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私有的交流空間，從而獲得「藏私」的寧靜感受。

女兒女婿都忙，也沒什麼時間坐在一起聊天談心，有很多事也不好說，畢竟是兩代人嘛，有時也怕女兒為難。一起在客廳看電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吧，大家喜歡看的也都不一樣。所以一空下來我就在自己的房間看手機視頻，或者跟老家玩得好的姐妹們發語音和視頻聊天，家長裡短，高興的，煩心的，什麼都說，有什麼不愉快的，她們開解開解，也好受多了。(11號受訪者)

傳統觀點認為，具身性移動會造成「地方」的破壞和地方感的喪失，Massey (1994) 從結構主義出發，提出一種區別於傳統「地方」觀的「進步的地方感」的概念，認為地方是在流動的社會關係網絡中被界定的，是那些「對連接點之間的開放的聯結」。英國地理學家Thrift (1996, 1997) 有類似的看法，他提出「地方的操演論」，認為「地方是由行事之人建構出來的，且地方從來都是未完成的，是不斷有人予以操演」。因此，地方是由實踐製造出來的開放的空間，是特定的時-空配置中由行動者之間的許多相遇而形成。

移動社交媒體興起以後，人們保持和建構對某一地域的歸屬更加能脫離肉身的固著，在本研究中，流動到城市的「老漂族」通過微信中介化連接，不斷地與流出地原有社會關係網展開互動和聯繫，在流入地獲得一種在家鄉的感覺，成為他們適應新環境的一種機制。

空間切換：「老漂族」返鄉中的微信使用

如前所述，「老漂族」借助微信對社會關係網的編織和攜帶，一方面補充了他們在流入地現實交往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與家鄉的聯繫，緩解思鄉之情，移動網絡上的虛擬存在在相當程度上能替代他們真正的在場。然而他們的「根」仍然在老家，各種社會身份也留在了老家，原生家庭的強大聚合力以及屬地化管理、戶籍制度的約束使得他們與家鄉有著千絲萬縷、割不斷的聯繫，因此仍然需要具身性地往返於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間。有別於普遍嚮往城市生活的農民工群體，「老漂族」們對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鄉有著更深的眷戀，同時由於不參與流入地的經濟活動，他們在流動時間的掌握上相對更加自由，返鄉頻率更高。本部分旨在考察第三個研究問題，「老漂族」們在返鄉過程中如何使用微信，這對他們在不同空間之間連接與切換有何作用？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在調查和訪談中，筆者了解到，受訪的「老漂族」們在近一年內都有過返鄉經歷，次數多的幾乎達到每月一次，少的也有一年一至兩次，每次的停留時間從幾天到幾個月、半年不等，具體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種是基於情感性的需要，主要是為了探親及禮俗往來等。有些老人的老伴還未退休，尚未脫離工作崗位，他們需要經常回老家團聚，有些老人的父母尚在世，他們也需不時回老家探望。碰上十一長假、春節等重要節假日，有時他們也會隨子女一起回鄉過節。除此之外，如有關係密切的親戚好友家裡婚喪嫁娶，他們偶爾也會回去出席和幫忙。

一種是基於功能性、事務性的需要，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這是受訪「老漂族」回鄉更常見的原因。按照現有戶籍制度的屬地管理規定，許多關係到身份福利的事務、手續要求必須回原籍地辦理，特別是養老金的年審。同時，由於醫保尚未實現全國統籌，老人們在老家辦理的醫保一般無法在異地正常使用，有些環節無法報銷，有些報銷手續異常繁瑣，為了省錢，小病可以在藥房、小診所「粗略治治」，嚴重時只能返回老家治療。

在家鄉和他鄉之間來回奔波，不僅使得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們身體上經受疲累，也容易遭受心理上的緊張感和漂泊感。筆者訪談中一位隨女兒移居到武漢的女士，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回湖南老家探望80多歲的老母親，由於內疚自己無法在母親身邊盡孝，又有女兒一家要照顧無法脫開身，每次返回武漢時都是哭著回來的。

來回奔波、周折於兩地，同伴們去去來來流動性大，也給他們在流入地社會交往和關係網絡的建立帶來不穩定性因素。調查中部分受訪者表示，由於流動頻繁產生「過客」心態，他們寧願不去與人深入交往。例如，小學校長退休的11號受訪者隨女兒一家來到武漢照顧外孫，由於老伴還沒退休，經常需要返回老家，這讓她在交往心態和行動上十分消極，加劇了社交疏離：

在這裡沒有什麼深入交往的朋友，也很少參加什麼社會團體活動，一般都是那種很隨意的、禮節性的交往，碰面點頭打個招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的那種。每次來這裡沒過多久我就回去了，最長就待了50天吧，有一種過客的感覺，也就沒有那種沉澱下來跟人深入交往的思想，長期下來就很鬱悶，感覺沒有在老家那樣隨心所欲，因為沒有深入交往的朋友嘛。

微信上我就跟老家的親戚朋友聯繫聯繫，在這裡也有偶爾在公園散步、打球認識的人，有幾個挺聊得來的，她們要加我私人微信，我都沒有加，沒有必要啊，認識不了多久我就回老家了。

流動人群如何在移動中維繫、發展、鞏固社會關係網絡一直是學者們關心的議題，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流動勞工群體和流動職業者，發現變動不居的地理位置移動的確是造成他們社會交往範圍狹窄、社交孤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本研究在調查中發現，一些「老漂族」通過微信的靈活運用，能夠根據自己地理位置上的移動，協調流動、暫居、安居之間的張力，使得他們在流入地建立的社會交往關係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進一步的維護和鞏固，同時也幫助他們快速勾連起家鄉的現實社會關係，從而賦予行動和交往上更多的能動性。

老人們一邊通過微信有意地加強與老家朋友聯繫來為返鄉後的交往做準備，一邊他們還會在流入地的微信群裡向其他成員告知他們回鄉及返回的時間，例如，在筆者觀察的一個「老漂族」微信群裡，4號受訪者剛回老家就向群裡告知：「我已經到了，這段時間有老師和姐妹的陪伴是我最大的快樂和幸福，望姐妹們天天開心舞舞，我會想你們的，兩個月後見」。此後，她在群裡不斷地回應其他人的詢問，預告她返回武漢的進程：「早晚要回武漢啦」、「快了，下個月就回，想你們啦！」、「快了，不到一個月就回，我也想你們啦！」、「姐妹們早上好！我十三號回」。可以看到，老年人普遍重視的告別、送別的傳統禮儀複製、延續到了他們社交媒體的交往中。由於過去缺乏每天常規的、跨越空間的聯繫管道，「老漂族」們之間的交往中時常出現「不告而別」的情況，這為他們彼此關係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而微信的傳遞使得他們的往返流動對於其他交往成員變得可預期，從而增強了他們對彼此交往關係的安全感。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在返鄉期間，大部分的受訪者也會時時刻刻關注群裡的大事小事，有的還會在微信群裡及時發佈、分享旅途趣事、家鄉美景、美食、見聞等，分享的形式主要是圖片和視頻，引來群裡其他成員們積極進行互動，紛紛表達讚美、祝福、關心、建議等等。圖片影像的全景展示在流動中建構起一種「共在」的真實感，通過微信群成員們之間的互動，個體的「返鄉」成為他們共同完成的體驗，而傳播者也在分享和被關注、被讚美之中獲得自我認同和滿足感，進而鞏固了對集體的認同。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回到老家後，想要迅速和當地的親朋好友聯繫上，老人們不是像過去那樣去挨家挨戶地串門或是在現實空間裡聚集，而是首先在老家各個微信群或者朋友圈裡宣告一聲「我回來了」，他們稱之為「報到」。這種虛擬在場的宣示標示著、勾連起肉身的在場，也使得久居於外的他們能在短時間內以較小的社交成本實現對家鄉社會關係網絡的迅速連接。類似的，老人們從老家返回到流入地之後，首先不是去實體的廣場舞隊裡匯合，而是在微信群裡「報到」——「姐妹們，我回來了」。借由「報到」的宣示和勾連，微信成為他們靈活開啟、切換流出地和流入地不同生活空間的閘門。

到了返鄉後期，返鄉者則會收到微信群其他成員們此起彼伏般的思念的表達，諸如，「想您了，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回來呀，很想你呀」、「快回來吧！我們也挺想你的」……在筆者觀察的兩個微信群裡，這樣的話語表達出現的頻次非常高。由於流動頻繁造成的關係脆弱和不確定性，「老漂族」們對於流入地建立起來的社會交往關係有著異常的焦慮和擔憂，「說不定這次回去後就因為什麼事不過來了」。這些在微信裡表達出來的思念和盼望不僅具有情感表達和情緒釋放的意義，也成為老人們維繫關係的策略和機制。而這些表達和關心也的確給漂泊於兩地的老年流動者們帶來很大的心理撫慰和自我價值感，增加了對團體的歸屬：

我上半年從深圳回了趟老家，深圳認識的那些朋友好捨不得我，走之前大家都在說，你去了要來啊，哎呀，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伴啊。一路上在微信裡問候，你到家沒，一路平安啊。現在也天天在群裡說，這個也想你，那個也想你，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你還來不來啊，那真是，喊得可憐。我們群裡的人都很好，對人坦率淳樸，很真誠，不多心，不像我們本地很多人那麼精怪，私心雜念多。(6號受訪者)

結論與討論：

移動社交媒體與城市老年流動人口能動性交往實踐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在親情的驅動下，大量老年人口隨子女流動到城市，為晚輩分擔照料家庭的責任，形成各大城市裡規模龐大、身體和心靈處於「雙重漂泊」的「老漂族」，這是當今「老齡化中國」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圖景。

這一代50後、60後老人們從年少到老年大多完整地經歷了上山下鄉、單位制大包大攬、改革開放、國企改制下崗等的社會文化變遷及生命歷程，深受傳統價值觀、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對現代性價值接受較慢，進入老年期後，他們面臨著多重性的適應壓力，在自我認同上存在從工作領域撤出、「社會角色」突然中斷、社會地位發生巨大落差的危機。由於突然脫離生活已久的故鄉，同時又不參與流入地的生產性勞動，他們在社會關係網的重建以及城市融入上面臨著比其他流動人群更大的困難。

本研究在傳統的「社會工作」視角之外，以媒介視角切入，試圖探討移動社交媒體為「老漂族」的社會交往實踐提供了怎樣的新的可能性。研究發現，「廣場舞」微信群成為「老漂族」們在流入地「落腳」、建立新的交往關係的入口，他們在網絡社區裡獲得「親如姐妹」的溫暖情誼，通過微信群對線下結伴活動的勾連，有可能進一步融入當地社區。另一方面，由於微信在各人群中的廣泛使用，他們因流動而斷裂的社會關係，如老家的親戚、朋友、同學、鄰居等，也可以通過微信的「攜帶」得到了持續的連接和維持，從而獲得一種「流動的地方感」。這對於那些在流入地不善於、不願意結交新朋友的老人們來說尤其有意義。而在不得不頻繁移動、返鄉的生活中，他們也可以根據自己地理上的位置移動，通過微信在老家和流入城市不同空間之間的連接和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切換，協調流動、暫居、安居不同狀態之間的張力，從而賦予行動和交往上更大的能動性。

智能手機和移動社交媒體的發展和普及成功地將過往在社會結構和互聯網接入、使用處於邊緣地位的老年人們納入進網絡社會的節點中。這是當前中國社會進一步「媒介化」(mediatization) (Livingstone, 2009; Schulz, 2004) 的突出現象，有學者謂之「數字弱勢群體的崛起」(周裕琮, 2018)。因此本研究的意義首先在於，在佔主導的「數字鴻溝」範式之外，對老年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新媒介交往實踐進行了呈現，描述了通常被認為是政治經濟結構和網絡技術中的邊緣群體——城市老年流動人口如何運用中介化的新傳播科技參與社會生活，能動地解決他們在流入地社會交往和心理上的困境。新型社交媒體微信為「老漂族」們社會關係網的修復、重建、形成新的社會交往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多的象徵性資源，也提高了他們在高速流動、個體化進程持續推進的現代社會中的適應性。

其次，本研究除了呈現「老漂族」如何通過微信的使用在流入地建立、擴展新的社會交往，也揭示出微信在「攜帶」舊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連接、切換不同空間裡的交往關係、商議闖關轉換的作用與機制，從而深化了關於新傳播媒介如何建構和創造「流動空間」、釋放空間潛能的認識。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儘管如本文揭示的那樣，傳播科技提高了「老漂族」們在社會交往上的能動性，然而他們想要「安適其所」面臨著制度上的根本障礙。由於全國統一的養老和醫保制度尚未建立，按照現有的醫保和社會保障政策，老人們在家鄉的醫保無法在流入地統籌，同時他們也無法享受到同本地老人一樣在交通出行、公共設施、養老費用優惠等福利。這些是他們目前在社會融入上最突出的制約因素，也會影響他們社會交往上的穩定和深入。

本研究存在諸多局限，首先在於樣本過於偏狹，本研究裡的訪談對象自身及其子女經濟條件較好，有一定的受教育水準，新媒體學習能力較強，而那些新媒體使用技能較差，甚至無力購買智能手機設備的「老漂族」，本文沒有涉及，這是本研究的重要局限性之一。此外，研究訪談對象都是中老年流動女性，所觀察的微信群裡的成員也主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是中老年女性，在調研中筆者發現，中老年男性在微信上的活動主要以玩遊戲、在公眾號上看小說為主，而對於參加微信群、與人聊天並不熱衷，他們流動到城市後的社會交往情況如何，有待於後來者及後續研究的深入考察。另外，由於深入訪談的樣本較少，本文在分析中沒有區分暫居者和定居者，他們各自在使用微信進行社會交往上有何不同，也值得做進一步詳細考察。此外，究竟是「廣場舞」本身還是「廣場舞」微信群對老人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網絡貢獻更多，也需要進一步結合量化研究，確定其中量化關係來進行分析。

本文提到「老漂族」們經常在微信裡討論與養老有關的話題並分享闡釋、建構共識，這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他們未來養老地點的選擇以及流動的方向，筆者將在今後做跟蹤觀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年傳播」是個亟待開掘的研究領域，期待更多同儕對老年流動人口與現代媒介的關係給予關注。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卜玉梅 (2012)。〈虛擬民族誌：田野、方法與倫理〉。《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217-236。
- Pu Yumei (2012). Xuni minzuzhi: Tianye, fangfa yu lunli. *Shehuixue yanjiu*, 6, 217-23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0月19日專題發佈會材料：《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內容概要〉。上網日期：2017年9月10日，取自 <http://www.nhfpc.gov.cn/zhuz/xwfb/201610/58881fa502e5481082eb9b34331e3eb2.shtml>。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jia weisheng he jihua shengyu weiyuanhui (2016, October 20). 2016nian 10yue 19ri zhuanli fabuhui cailiao: *Zhongguo liudong renkou fazhan baogao 2016* neirong gaiyao.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17, from <http://www.nhfpc.gov.cn/zhuz/xwfb/201610/58881fa502e5481082eb9b34331e3eb2.shtml>.
- 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 (2017年2月16日)。〈生活在此處——社交網絡賦能報告〉。上網日期：2017年9月20日，取自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64601.html>。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Zhongguo shekeyuan guoqing diaocha yu dashuju yanjiu zhongxin, Tengxun huiyuan yu shehui yanjiu zhongxin (2017, February 16). *Shenghuo zai cichu—shejiao wangluo funeng baogao*.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64601.html>.

王霄冰 (2008)。《儀式與信仰——當代文化人類學新視野》。北京：民族出版社。
Wang Xiaobing (2008). *Yishi yu xinyang—dang dai wenhua renleixue xinshiyue*.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艾媒諮詢 (2016年11月29日)。〈2016年APP與微信公眾號市場研究報告〉。
上網日期：2017年11月20日，取自 <http://www.iimedia.cn/46539.html>, 2016-11-29。

Aimei zixun (2016, November 29). 2016nian APP yu weixing gongzhonghao shichang yanjiu baogao.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iimedia.cn/46539.html>.

安東尼·吉登斯 (2011)。《現代性的後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Giddens, A.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ongni Jidengsi (2011). *Xiandaixing de houguo* (Tian He,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iddens, A.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亨利·列斐伏爾 (2003)。〈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王志弘譯)。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頁49–51)。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原文 Lefebvre, H.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 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 Irvington.)

Hengli, Liefefuer (2003). Kongjian: Shehui chanwu yu shiyong jiazhi (Wang Zhihong, Trans.). In Bao Yaming (Ed.), *Xiandaixing yu kongjian de shengchan* (pp. 49–51).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Original article: Lefebvre, H.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 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 Irvington.)

邱林川 (2013)。《資訊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Qiu Linchuan (2013). *Zixun shidai de shijie gongchang—xingongren jieji de wangluo shiji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李靜雅 (2014)。《「老漂族」的城市社會融入問題研究——基於上海社區25位老人的訪談》。華東理工大學碩士論文。

Li Jingya (2014). “*Laopiao zu*” de chengshi shehui rongru wenti yanjiu—jiyu Shanghai M shequ 25wei laoren de fangtan. Huadong ligong daxue shuoshi lunwe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吳歡(2013)。《虛擬社區與老年線民的社會資本——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Wu Huan (2013). *Xuni shequ yu laonian xianmin de shehui ziben—dui “laoxiaohai wangzhan” de ge’an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萬紅霞、陳豔、韓中華、何雲燕(2004)。〈北京市流動老年人口特徵及成因分析〉。《人口研究》，第6期，頁53-59。

Meng Xiangjing, Jiang Xiangqun, Song Jian, & Wan Hongxia et al. (2004). Beijingshi liudong laonian renkou tezheng ji chengyin fenxi. *Renkou yanjiu*, 6, 53-59.

周裕瓊(2018)。〈數字弱勢群體的崛起：老年人微信採納與使用影響因素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第7期，頁66-86。

Zhou Yuqiong (2018). Shuzi ruoshi qunti de jueqi: Laonianren weixin caina yu shiyong yingxiang yinsu yanji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7, 66-86.

段義孚(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潘桂成譯)。台北：國立編譯館。(原書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uan Yifu (1998). Jingyan toudong de kongjian he difang (Pan Guicheng Trans.). Taipei: Guoli bianyiguan. (Original book: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約翰·費斯克等(2004)。《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李彬譯)。北京：新華出版社。(原書 O’Sullivan, T., Hartley, J., Saunders, D., Montgomery, M., & Fiske, J. [1994].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Yuehan Feisike et al. (2004). Guanjian gainian: Chuanbo yu wenhua yanjiu cidian (Li Bin, Trans.).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O’Sullivan, T., Hartley, J., Saunders, D., Montgomery, M., & Fiske, J. [1994].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孫九霞、周尚意、王寧、朱竑、周大鳴、甄峰、劉行健、楊晶晶、陳敬複、楊茜好(2016)。〈跨學科聚焦的新領域：流動的時間、空間與社會〉。《地理研究》，第10期，頁1801-1818。

Sun Jiuxia, Zhou Shangyi, Wang Ning et al. (2016). Kuaxueke jujiao de xinlingyu: Liudong de shijian, kongjian yu shehui. *Dili yanjiu*, 10, 1801-1818.

孫信茹(2016)。〈微信的「書寫」與「勾連」——對一個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0期，頁6-24。

Sun Xinru (2016). Weixin de “shuxie” yu “goulian”—dui yige pumizu cunmin weixinqun de kaocha.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0, 6-24.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 孫瑋(2015)。〈微信：中國人的「在世存有」〉。《學術月刊》，第12期，頁5-18。
- Sun Wei (2015). Weixin: Zhongguoren de “zaishi cunyou”. *Xueshu yuekan*, 12, 5-18.
- 唐魁玉、邵力(2017)。〈微信民族誌、微生活及其生活史意義——兼論微社會人類學研究應處理好的幾個關係〉。《社會學評論》，第2期，頁76-85。
- Tang Kuiyu, Shao Li (2017). Weixin minzuzhi, weishenghuo jiqi shenghuoshi yiyi—jianlun weishehui renleixue yanjiu ying chulihao de jige guanxi. *Shehuixue pinglun*, 2, 76-85.
- 烏爾里希·貝克(2004)。《風險社會》(何博文譯)。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Beck, U.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 Beck, U. (2004). Fengxian shehui (He Bowen, Trans.). Bei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ck, U.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 烏爾里希·貝克、伊莉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2011)。《個體化》(李榮山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uerlix Beike, Yilishabai Beike-Geensihaimu (2011). *Getihua* (Li Rongshan et al.,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陳璐、許驍(2017年8月9日)。〈四成「老年漂」為照顧晚輩而來，七成受訪者感覺孤獨〉。上網日期：2017年12月20日，取自<http://www.bjnews.com.cn/graphic/2017/08/09/453632.html>。
- Chen Lu, Xu Xiao (2017, August 9). Sicheng “laonianpiao” wei zhaogu wanbei erlai, qicheng shoufangzhe ganjue gudu.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bjnews.com.cn/graphic/2017/08/09/453632.html>.
- 張紅濤、席娟(2015)。〈增能視角下城市「老漂族」的社會工作介入初探——以濟南市為例〉。《老齡科學研究》，第6期，頁31-39。
- Zhang Hongtao, Xi Juan (2015). Zengneng shijiaoxia chengshi “laopiao” de shehui gongzuo jieru chutan—yi Jinanshi weili. *Laoling kexue yanjiu*, 6, 31-39.
- 曼紐爾·卡斯特(2001)。《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 Castells, M. [2000].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 Mannier Kasite (2001). *Wangluo shehui de jueqi* (Xia Zhujiu et al.,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astells, M. [2000].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 張豔如 (2017年4月28日)。〈老年人愛上玩微信：搖一搖約廣場舞伴 建群分享雞湯〉。上網日期：2017年9月20日，取自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4/28/content_16006212.htm。
- Zhang Yanru (2017, April 28). *Laonianren aishang wanweixin: Yaoyiyao yue guangchang wuban jianqun fenxiang jitang*. Retrieved on September 20, 2017, from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4/28/content_16006212.htm.
- 景軍 (2017年3月16日)。〈中國家庭變遷三十年：小皇帝、農村婦女、老人〉。上網日期：2017年11月17日，取自界面新聞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76877.html?t=t>。
- Jing Jun (2017, March 16). *Zhongguo jiating bianqian sanshinian: Xiaohuangdi, nongcun funv, laoren*. Retrieved on November 17, 2017, from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176877.html?t=t>.
- 黃厚銘、曹家榮 (2015)。〈「流動的」手機：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已關係〉。《新聞學研究》，第124期，頁39-81。
- Huang Houming, Cao Jiarong (2015). “Liudong de” shouji: Yetai xiandaixing de shikong jigou yu qunji guanxi. *Xinwenxue yanjiu*, 124, 39-81.
- 凱度調研 (2016年1月29日)。〈2016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上網日期：2017年9月20日，取自 <http://www.useit.com.cn/thread-11332-1-1.html>。
- Kaidu diaoyan (2016, January 29). *2016 zhongguo shejiao meiti yingxiang baogao*. Retrieved on Sept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useit.com.cn/thread-11332-1-1.html>.
- 凱度調研 (2017年6月8日)。〈2017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上網日期：2017年9月20日，取自 <http://www.useit.com.cn/thread-15543-1-1.html>。
- Kaidu diaoyan (2017, June 8). *2017 zhongguo shejiao meiti yingxiang baogao*. Retrieved on Sept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useit.com.cn/thread-15543-1-1.html>.
- 黃璜 (2013)。〈老年人口遷徙研究述評〉。《人文地理》，第4期，頁27-33。
- Huang Huang (2013). *Laonian renkou qianxi yanjiu shuping*. *Renwen dili*, 4, 27-33.
- 楊芳、張佩琪 (2015)。〈「老漂族」面臨的政策瓶頸與突破路徑——基於廣州H社區的實證分析〉。《社會保障研究》，第3期，頁10-14。
- Yang Fang, Zhang Peiqi (2015). “Laopiao zu” mianlin de zhengce pingjing yu tupo lujing—jiyu Guangzhou H shequ de shizheng fenxi. *Shehui baozhang yanjiu*, 3, 10-14.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 雷蒙·威廉士(1994)。《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馮建三譯)。台北：遠流。(原書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 R. (1994). *Dianshi: Keji yu wenhua xingshi* (Feng Jiansan, Trans.). Taipei: Yuanliu. (Original book: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 蓋龍濤、康智凱、黃子珺(2017)。〈老年人與信息技術：基於SSCI等五個引文索引的研究進展〉。《中國老年學》，第10期，頁2562-2567。
- Gai Longtao, Kang Zhikai, Huang Zijun (2017). *Laonianren yu xinxi jishu: jiyu SSCI deng wuge yinwen suoyin de yanjiu jinzhan*. *Zhongguo laonianxue*, 10, 2562-2567.
- 趙旭東(2017)。〈微信民族誌時代即將來臨——人類學家對於文化轉型的覺悟〉。《探索與爭鳴》，第5期，頁4-14。
- Zhao Xudong (2017). *Weixin minzuzhi shidai jijiang lailin—renleixuejia duiyu wenhua zhuanxing de juewu*. *Tansuo yu zhengming*, 5, 4-14.
- 齊格蒙特·鮑曼(2002)。《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原書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man, Z. (2002). *Liudong de xiandaixing*. (Ouyang Jingge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滿家輝(2014年7月11日)。〈多棱鏡：「老漂」的快樂與無奈〉。《人民日報》，第15版。
- Man Jiahui (2014, July 11). *Duolengjing: "Laopiao" de kuaile yu wunai*. *Renmin ribao*, 15.
- 蔡琰、臧國仁(2012)。《老人傳播理論、研究與教學實例》。台北：五南出版社。
- Cai Yan, Zang Guoren (2012). *Laoren chuanbo lilun, yanjiu yu jiaoxue shili*. Taipei: Wunan chubanshe.
- 劉亞娜(2016)。〈社區視角下老漂族社會融入困境及對策——基於北京社區「北漂老人」的質性研究〉。《社會保障研究》，第4期，頁34-43。
- Liu Yana (2016). *Shequ shijiaoxia laopiaozu shehui rongru kunjing ji duice—jiyu Beijing shequ "beipiao laoren" de zhixing yanjiu*. *Shehui baozhang yanjiu*, 4, 34-43.
- 劉覲議(2015)。〈微信朋友圈中的「印象管理」行為分析〉。《新聞界》，第3期，頁58-62。
- Liu Yanyi (2015). *Weixin pengyouquanzhong de "yinxiang guanli" xingwei fenxi*. *Xinwenjie*, 3, 58-6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劉慶(2012)。「老漂族」的城市社會適應問題研究——社會工作介入的策略。《西北人口》，第4期，頁23-26。

Liu Qing (2012). “Laopiao zu” de chengshi shehui shiying wenti yanjiu—shehui gongzuo jieru de celve. *Xibei renkou*, 4, 23-26.

潘忠黨、於紅梅(2015)。「閾限性與城市空間的潛能——一個重新想像傳播的維度」。《開放時代》，第3期，140-157。

Pan Zhongdang, Yu Hongmei (2015). Yuxianxing yu chengshi kongjian de qianneng—yige chongxin xiangxiang chuanbo de weidu. *Kaifang shidai*, 3, 140-157.

羅伯特·V·庫茲奈特(2016)。《如何研究網絡人群和社區：網絡民族誌方法實踐指導》(葉韋明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原書Kozinets, Robert. V. [2010].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London: Sage.)

Kozinets, Robert, V. (2016). Ruhe yanjiu wangluo renqun he shequ: Wangluo minzuzhi fangfa shijian zhidao (Ye Weiming, Trans.). Chongqing: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ozinets, Robert. V. [2010].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London: Sage.)

蘭德爾·柯林斯(2009)。《互動儀式鏈》(林聚任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2009). *Hudong yishilian* (Lin Jure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Anderson, M., & Perrin, A. (2017, May 17). *Tech adoption climbs among older adults*.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7/05/17/tech-adoption-climbs-among-older-adults/>.

Atchley, R. C. (1972). *The social forces in later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geront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Atchley, R. C. (1989). A continuity theory of norma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29(2), 183-190.

Barak, A., Boniel-Nissim, M., & Suler, J. (2008). Fostering empowerment in online support grou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5), 1867-1883.

Bland, R. (1996). *Developing services for older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ress.

Blau, Z. S. (1973). *Old age in a changing society*.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a division of Franklin Watts, Inc.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 Blit-Cohen, E., & Litwin, H. (2004). Elder participation in cyberspac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sraeli retiree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8*(4), 385–398.
- Bounds, J., & Hepburn, H. (1996). *Empowerment and older people: A practical approach*. Birmingham: Pepar.
- Caro, F. G., Bass, S. A., & Chen, Y. P. (1993). Introduction: Achieving a productive aging society. In S. A. Bass, F. G. Caro, & Y. P. Chen (Eds.), *Achieving a productive ageing society* (pp. 1–25). Westport, CT: Auburn House.
- Chayko, M. (2008). *Portable communities: The social dynamics of online and mobile connectednes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otten, S. R., Anderson, W. A., & McCullough, B. M. (2013).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loneliness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among older adult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5*(2), 1–13.
- Cresswell, T. (2006).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Cuba, L., & Hummon, D. M. (1993). A place to call home: Identification with dwelling, community and reg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1), 111–131.
- Cumming, E., & Henry, W. (1961).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Cutchin, M. P. (2001). Deweyan integration: moving beyond place attachment in elderly migr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52*(1), 29–44.
- Fernández Ballesteros, R. (2008). *Active ag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Hogrefe & Huber.
- Garfein, A. J. & Herzog, A. R. (1995). Robust aging among the young-old, old-old, and oldest-old. *Journal of Gerontology, 50B*(2), S77–S87.
- Gatto, S. L., & Tak, S. H. (2008). Computer, internet, and e-mail use among older adults: benefits and barrier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34*(9), 800–811.
- Havighurst, R. J. (1961).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1*(1), 8–13.
- Heidegger, M. (1971).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A. Hofstadter (Ed.),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145–161). New York: Harper & Row.
- Hiller, H., & Franz, T. (2004). New ties, old ties and lost ti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diaspora. *New Media & Society, 6*(6), 731–752.
-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 Hymes, D. H. (1980). Functions of speech. In D. H. Hymes (Ed.), *Language in education* (pp. 1–18).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Ihm, J., & Hsieh, Y. P. (2015). The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for the social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10), 1123–1138.
- Kam, Ping-Kwong. (1996). Empowering elderly people: A community work approach.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31*(3), 230–240.
- Kelley, C. et al. (1999). Predictors of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system use in older adult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5*(1), 19–35.

- Khaw, K. T. (1997). Healthy ag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5, 1090–1096.
- Lam, J. C. Y., & Lee, M. K. O. (2006). Digital inclusiveness-longitudinal study of internet adoption by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2(4), 177–206.
- Lee, E.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1), 47–57.
- Licoppe, C. (2003). Two modes of maintai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hrough telephone: From the domestic to the mobile phone. In J. E. Katz (Ed.), *Machines that become us: The social context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p. 171–186). New Brunswick, CA: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ivingstone, S. (2009).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ICA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 1–18.
- Marshall, V. W. (1979). No exit: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9(4), 345–58.
- Marquié, J. C., Jourdan-Boddaert, L., & Huet, N. (2002). Do older adults underestimate their actual computer knowledge?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1(4), 273–280.
- Massey, D. (1991).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Marxism Today*, 35(6), 24–29.
- Massey, D. (1994).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D. Massey (E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pp. 155–16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errin, A. (2015, October 8). *Social media usage: 2005–2015*.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17,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5/10/08/social-networking-usage-2005-2015/>.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 Rowe, J. W., & Kahn, R. L. (1987). Human aging: Usual and successful. *Science*, 237(4811), 143–149.
- Rowe, J. W., & Kahn, R. L. (1997).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37(4), 433–440.
- Rowe, J. W., & Kahn, R. L. (1998). The structure of successful aging. In J. W. Rowe & R. L. Kahn (Eds.), *Successful aging* (pp. 36–52).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uth, J., & Kenyon, G. (1996). Biography in adult development and aging. In J. Birren, G. Kenyon, J. Ruth, J. Schroots, & T. Svensson (Eds.), *Aging and biography* (pp. 1–21). New York: Springer.
- Sade-Beck, L. (2004) Internet ethnography: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3(2), 1–14.
- Schulz, W.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1), 87–101.
- Seamon, D. (1980).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In A. Buttner & D. Seamon (Eds.),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pp.148–165). London: Croom Helm.
- Selwyn, N. (2004). The information aged: A qualitative study of older adults'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8(4), 369–384.
- Sheller, M., & Urry, J.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2), 207–226.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 Sinnott, J. D. (1977). Sex-role inconstancy, biology, and successful aging. *Gerontologist*, 17(5 Pt 1), 459–463.
- Sum, S. et al. (2008).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ocial capital: How the internet affects seniors' soci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1), 202–220.
-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s*. London: Thousand Osk, CA.
- Thrift, N. (1997). The still point: Resistance, expressiveness embodiment and dance. In S. Pile & M. Keith (Eds.), *Geographies of resistance* (pp. 124–151). London: Routledge.
- Tilly, C. (1990). Transplanted networks. In V. Yans-McLaughlin (Ed.),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pp. 7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rnstam, L. (2005). *Gerotranscendence: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positive aging*. New York, NY: Springer.
- Urry, J. (2000a).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Urry, J. (2000b). Mobile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185–203.
- Urry, J. (2003). *Global complex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rnes, T. (1992). Migr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 Champion & T. Fielding (Eds.),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patterns: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p.175–187). London: Belhaven Press
- Williams, A., & Ylänne-McEwen, V. (2000). Elderly lifestyles in the 21st century: Doris and Sid's excellent adven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3), 4–8.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pril). *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 Retrieved November 10, 2017, from <http://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67215>.
- Zerubavel, E. (2003).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7期(2019)

附錄一 訪談提綱

1. 基本情況：姓名、年齡、職業(何時退休、退休前職業和崗位)、文化程度、個人生活經歷、家庭成員基本情況、居住環境。
2. 因為什麼原因去外地/來武漢？最長待了多久？多久往返一次？往返的原因是什麼？
3. 在外地生活遇到哪些困難？怎麼緩解和克服的？每天從早到晚的日程是怎樣的？
4. 在外地一般和哪些人保持聯繫？認識的新朋友多嗎？通過哪些管道認識的？認識後一般加微信的多嗎？
5. 加的群裡，哪些是老家群，哪些是本地群？在老家/外地時平時看哪些群比較多？看哪些內容比較多？平時在哪些群裡發言比較多？一般談論哪些內容？
6. 一般因為什麼原因回老家？回老家後怎麼跟老家朋友聯繫？跟外地朋友有沒有聯繫？主要聊哪些內容？

附錄二 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編號	性別	年齡	籍貫	退休前工作單位性質	現居地	備註
1號受訪者	女	56歲	湖北	教育機構	武漢	隨女兒遷居到武漢
2號受訪者	女	62歲	湖北	事業單位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3號受訪者	女	55歲	湖北	醫療機構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4號受訪者	女	61歲	江西	個體戶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5號受訪者	女	63歲	湖北	醫療機構	武漢	隨兒子遷居到武漢
6號受訪者	女	65歲	湖北	醫療機構	H縣	曾隨兒子在深圳短暫居住
7號受訪者	女	65歲	湖北	政府部門	H縣	曾隨女兒在青島短暫居住
8號受訪者	女	57歲	湖北	教育機構	H縣	曾隨兒子在上海短暫居住
9號受訪者	女	76歲	湖北	政府部門	H縣	曾隨兒子在武漢短暫居住
10號受訪者	女	55歲	湖北	國企	H縣	曾隨女兒在武漢短暫居住
11號受訪者	女	58歲	湖北	教育機構	H縣	曾隨女兒在武漢短暫居住

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

本文引用格式

王豔 (2019)。〈移動連接與「可攜帶社群」：「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及其社會關係再嵌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7期，頁87-133。